

——丘濬与明代文坛革新

□ 管仲乐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庵，出生于海南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鎮金花村），时人尊其为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丘濬一生，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曾参与《寰宇通志》《英宗实录》《大明一统志》《续资治通鉴纲目》《宪宗实录》的编纂工作，弘治七年（1494年）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卒年七十四岁，赠太傅左柱国，谥文庄。

丘濬不仅是明朝成化、弘治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早负“神童”“读绝”盛名，身后御赐“理学名臣”，史称一代“文臣之宗”。可以说，丘濬的读书和笔耕紧密伴随着他一生的仕宦生涯，他对于文风、学风的思考与实践也在此过程中渐次开展。

博极群书，积学成德为己任

丘濬的文坛革新理念根基为其渊博的学识，而这与其自幼博览群书密切相关。丘濬在明朝宰辅中即以“手不释卷，举凡六经诸史，古今诗文，九流疏之书，以至于医卜老释之说，无不探究。而此种阅读习惯始于其童蒙时期，其弟子蒋冕（1463—1532年）提及丘濬时，称其“自幼有志于学，凡身之所至，耳目之所见闻，心思之所想，苟有益于身心，有资于学识，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无一而不究诸心焉”。事实的确如此，丘濬自小就热爱读书，十三岁时已熟读五经，并多方阅览其他领域的书籍。

丘濬家庭并不富裕,《藏书石室记》载,他七岁丧父,家中多数百卷的书籍尽数散失,所余书籍也多为支离破碎之残书。由于无法找到可参考或阅读的书籍,他又对知识有着极度渴望,因此他扩展了阅读来源。一方面“求诸于市肆”,《西园闻见录》载,丘濬无钱购书,便“借诸市肆,虽书老技术亦所不废”。然而市场上所售书籍大多是俚俗胶胶,带来的收获甚小,因此,丘濬亦经常向亲朋好友借阅,“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必乃得已”。在借书过程中,丘濬时常遭受冷眼,“甚至为人所厌薄,厉声色以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怒”。但丘

濬并没有任何怨愤之情，功成名就后，在故乡创建奇甸书院、修造藏书石室，回馈乡亲。

景泰五年（1454年），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初到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并担任编修。翰林院为全国典籍汇聚之所，丘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极力汲取知识的滋养，因此在翰林院任职的几年光阴，为他的学问奠定了基础。同时，丘濬在其京城居所建立了他的私人书斋，名为“槐阴书屋”。在“槐阴书屋”中，丘濬“日居其间，翻阅书史，口诵心惟。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丘濬通过博览群书，提升了他在经史方面的造诣，为他后来改革文风、参议国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明代古籍《双槐岁钞》记录了丘濬嗜书之事：“慨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家积书万卷，与人谈古今名理，衮衮不休”。读万卷之书，通古今之理，因此丘濬与人交谈，可以“衮衮不休”，被称为“当代通儒”。

返体于正，明道达
用纠文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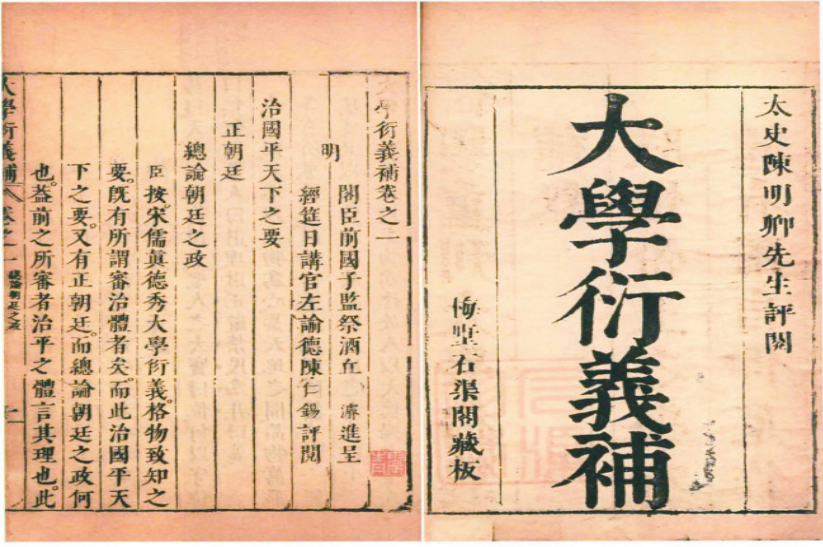
永历至成化几十年间，在“太平盛世”的氛围下，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尽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应制”和应酬之作，诞生的所谓“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骤之气，徒有其工丽之形。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倡导，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模仿，以致沦为流弊，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而且千篇一律。“台阁体”衰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草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在茶陵诗派的崛起，以及随后李梦阳



丘濬像

何景明“前七子”倡言复古之前，丘濬就已经注意到此弊端。

丘濬生于珠崖，经史知识多靠自学积累。到了北京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时任国子监祭酒萧铎门下学习。萧铎擅长文学，不重空言，丘濬受此影响亦文风严谨，思想和学术专注于经世致用。丘濬常说的是“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达意而止，质实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无滓，绎然其无类，淡乎其有余味”。即为学作文应该遵循经典实例时而作，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文风应该是理正气盛、雅正温厚、平易畅畅，而非奇诡险怪、浮华空疏。即便作诗，丘濬也倡导自然趣味，主张“吐词操语不用奇，风行水上翫抽丝。眼前景物口出奇，便是诗家绝妙词”。丘濬将此理念应用于自身创作中，如“帝城品物多佳味，每恨慈亲未得尝”（《思亲》），“孔怀此日归心切，常见他年有命无。最是不堪闻感处，霜天鸿雁夜相呼”（《闻中怀有怀兄》）皆不重辞藻堆砌，但蕴含了极为浓厚的真实情感。因



丘濬著《大学衍义补》（明崇禎刻本），现藏山西大学

此，得到了后人“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为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顺畅可读”的评价。

成化十三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为翰林院学士，四个月后又升为国学监祭酒（从四品）直至1487年。十年间，身为国学监祭酒的丘濬注意到当时文坛已然出现了不正之风，对此他讲道：“近年以来，书肆无故刻出晚宋《论范》等书，学者靡然效之，科举之文遂为一变。说者谓宋南渡以后无文章，气势因之不振，殆谓此等文字欤？”丘濬致力于整顿当时的写作风气，认为好文风关键在于文章的意旨，文藻措辞则不是考量的重点。因此，丘濬借助与同僚程敏政、王鏊、李东阳等人的诗文唱和，重振平易醇厚的文风，力求“以文章领袖缙绅”，重肃时代风气。

痛抑时弊，取贤纳士肃学林

丘濬作为明朝中期的文坛领袖，

同时担任国子监祭酒十年，学子中有不少他的门人。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心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苦苦思索挽救与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策略，不遗余力矫正文风士风。丘濬秉承儒家“内圣外王”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经世致用”的建议，殷切地希望统治者能将儒学思想付诸统治的实践中。由此，他萌发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阐述儒家治国思想，以达到帮助君王治理国家的想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等多部著述。

但丘濬的理想并不仅局限自身著书立说，更以一代文宗为己任，呼吁读书之人文风要正。丘濬认为，文风的歪曲势必会对科举制度产生显著冲击，倘若在科考过程中出现不合时宜的文章，不仅作者本人将遭受落第之痛，更会给整个科举风气带来干扰。再者，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定然会影响行政体系的平稳运转，进而为明王朝的统治埋下潜在隐患。因此，丘濬随即阐述了其本人对革除文风之弊的

期许：“伊欲正人心，作士气，以复祖宗之旧，使明经者潜心玩理，无穿凿空疏之失，修辞者顺理达意，无险怪新奇之作，命题者随文取义，无偏主立异之非。”

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还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命题者随文取义”，不要有偏离正统文风的目标出现。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经书之旨，不求怪怪新奇，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明史·丘濬传》记载：“时生员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经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淳切告诫，正文体于正。”丘濬将不良文风形成原因归结于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他认为明朝初年的科举考官出题“深求隐僻，强裁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依据，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科举士子们必须尽可能专心通读所有经书，才能保证在科考的过程中从容应对，这就导致考生过分关注经典文句的训诂解析，而忽视了治学的根本——经世致用。因此，丘濬的科举文风改革思想旨在净化日渐支离的学风，抵制心学的不良影响，重塑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从不满足于单纯地博览群书，而是心怀济世之志，以天下为己任。故丘濬希望天下读书人应当恪守程朱理学所规划的道德修养体系，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投身事业，通过研读儒家典籍来探究治世之道，匡正学风的凋敝与政局的衰败，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

历史学家钱穆曾给予丘濬高度评价：“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丘濬为官四十载，廉洁自持，恪尽职守，八转官阶，位极人臣，真正做到了“遥从海外数中原”。他不但始终按儒学“内圣外王”的标准衡量自己，以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要求塑造自己。同时，丘濬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重振醇厚正大之学风，矫正娇柔险怪之文坛，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接1版)一方面,加快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培育科技领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汇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组织推进重点领域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支持政策,持续深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动力，产业是载体，资金是支撑，人才是关键。当前，上海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以加快建设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主攻方向，统筹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我们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动“五个中心”联动发展、耦合共生、相互赋能，更好促进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努力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把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推动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功能全面升级，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一是打造体系化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和保障在沪国家实验室及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高质量

量运行发展，完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创新体系，建好用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培育更多原创力强的“链主”企业。二是提升重点领域基础研究水平。加强基础研究系统部署和前瞻布局，推动建设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前沿科学中心，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建立健全高风险基础研究风险分担机制，力争取得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三是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组织实施模式，完善行业、企业出题机制，优化“揭榜挂帅”“赛马”等实施路径，努力破解一批“卡脖子”环节，在产业发展最前沿、最具潜力的领域抢占先机。四是健全科创产业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张江高新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区建设，加快打造一批高质量孵化器，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构建科技咨询、研发测试等全链条科研服务体系，努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产业资源集聚耦合、叠加碰撞，形成产业发展“核爆点”。

着力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2+2)+(3+6)+(4+5)”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一批世界级

高端产业集群。一是推动“2+2”，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业融合”，一手抓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两个转型”，促进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企业发展，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鼓励钢铁、化工、电力等传统高耗能企业实施绿色化技术改造，建设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和绿色低碳供应链体系，努力把传统产业打造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二是壮大“3+6”，打造新兴产业创新高地。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勇担使命任务，深入实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下大力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六大重点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打造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2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三是培育“4+5”，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赛道产业行动方案，持续加强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五大未来产业方向布局，聚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核心环节和技术堵点，积极探索产业发展路径、投融资模式和支持政策，努力在若干细分领域率先确立产业发展优势。

着力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着眼科技创新和业创新全链条、全过程，积极疏资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的主渠道，大力升金融服务质效，以高效率资金给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是推动金融更好支持全过程创。依托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健全以科技信贷、科保险、股权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为基本架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行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专业社会组织等作用，引导长期资、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打通科技企业孵化的“最先一里”。配合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化资本市场改革，提升上海证券易所主板、科创板等功能，打通科技企业上市的“最后一公里”。是推动金融更好支持产业体系升发展。引导金融机构适应技术、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特点以丰富和服务，探索绿色金融、转型金、数字金融等新业务，综合运用种金融工具，为短板产业补链、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产业延链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三是推动金融更好支持经营主稳健发展。特别是大力发展普惠融，完善普惠金融顾问制度、大据普惠金融应用平台、政策性融担保基金等服务机制和策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水

努力促进广大中小微企业综合成本稳中有降。

着力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按照新质生产力要求,制定实施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政
深入推进人才和教育、科技资
集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产
新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和
支持。一是放眼全球加快集聚
次人才。发挥开放引才的综合
优势,深入实施人才高峰工程、重
业人才引育专项等计划,持续
“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等品牌,
引进集聚一批站在国际科技前
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方向的战略
家及其团队,更大规模引进海
外人才俊。同时,深化教育综合
改革,完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机制,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能力。二是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加大人才发现、推
评价等各环节放权松绑力度,
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管理等改
建立定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制,构建梯次合理的金字塔形
结构,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
活力。三是打造高品质人才生态。
对接人才在落户、安居、出入
方面的需求,深入实施全球人
享服务、人才全周期服务改
整合优质资源,提升服务品
努力营造世界一流的人才发展
环境。